

历史记忆、文化认同与意义选择

——云南方志中星回节起源记载的忠节化倾向

张若兰

提 要：云南古代至近代的地方志对星回节起源皆有记录。记录详略不一，但总体看来，附着儒家忠义贞烈观的阿南、慈善夫人、诸葛亮等传说占据重要地位，而占岁、照田及少数民族表现抗争除害等起源说则日益弱化，影响式微。忠节化成为星回节起源在云南方志记载中的绝对主流。这一忠节化倾向体现了方志编撰者基于儒家立场而对历史记忆及节俗传说进行的选择性改造和集体无意识援引转述。而如此选择与援引的根源，正是儒家思想在云南的传播与发展带来的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主流文化的认同，并反映出儒家思想传播中的多元途径与借力因素。

关键词：云南 星回节 忠节化 文化认同

星回节，是滇、贵、川等地彝族、苗族、拉祜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的共有节日。在当下部分地区和民族中，星回节与火把节已基本混同，多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或二十五，其习俗多与火有一定关系，且星回节的名称也逐渐弱化和退隐。云南历代方志史料中，星回节也多与火把节混作一谈，多称火把节为星回节之俗名或别称。^①然而令人疑虑的是，当下彝族、白族等少数民族的火把节多在六月二十四或六月二十五，而南诏时则有星回节在十二月的明确记载与文献支撑，足证彼时星回节与当下之火把节的时间相差竟有6个月之久。对此，前人早已有所考辨，然诸说不一，并未有服众之公论。笔者较认可的是，星回节名称的出现与当时少数民族对星宿的观测及对火的崇拜有关。^②所谓星回，本指天空特定星辰的位置与指向。^③星回节曾有二期，一在农历的年中六月，一在农历的年尾十二月。随着汉文化的深入传播与普及，滇云一带年尾的星回节因与汉族的岁末年节时间相重叠，逐渐弱化淡出，六月之星回节则保留并逐渐与原生于火崇拜的火把节合一。然而，关于星回节之考论极多，笔者不在此赘论其起源究竟如何，也不细作考辨，仅对

① 民国《宜良县志》云：“二十四、二十五两日为星回节，俗曰火把节。”（“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2009年影印版，第2册，第141页）康熙《峨嵋县志》云：“六月二十四日夜束薪为燎，燃之，以腥肉为胜，互相馈请，谓火把节，又谓星回节。”（“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32册，第378页）此外，星回节还有“滇炬节”“六月节”“火节”等称。火把节与星回节交互为名的现象，其缘由或许正与以火把迎接星回的传统习俗有关。由于火把富有鲜明的寓意与象征性，对星宿的观测又非普通民众所能掌握，故而星回的含义逐渐隐去，而火把的盛燃逐渐显明。星回，只是作为古称被保留下来，火把节成为耳熟能详的通称。同时，在白语中，火把节的一个说法是“薪毁架”，其发音十分接近于“星回节”，这也有助于理解白族地区星回节与火把节合一的称名由来。

② 尚有佛教说认为星回节与泼水节有相似处等。

③ 不少学者认为星回与北斗七星斗柄的指向有关，即六月二十四前后大暑时节，北斗七星斗柄正向上指。至十二月十六前后大寒时节，北斗七星斗柄正向下指。故而以此二日为星回之节。王小盾则认为星回节的确定，与彝族以“昂星观测”来确定“时首”的年历测算相联系，认为“‘星回节’的确是因昂星回归天空而得名的”。详见王小盾：《论火把节的来源——兼及中国民族学的“高文化”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云南地方志中的星回节起源记载加以探究。同时,为论述之便,对此节日,行文中皆以星回节统称。

星回节虽非云南独有,却是云南方志中具有相当普遍性和影响力的节日。云南古近代各通志及府县志的风俗、节庆等部分,多对其渊源、时间、习俗等有记录。有关记录虽颇有雷同,亦见取舍微殊。推究可见,对星回节起源的记述体现了深刻的文化背景及思想内涵。尤其是星回节起源记录的普遍忠节化倾向,更值得关注和深究。

一 雷同与偏向——云南史志典籍对星回节起源的记载与取舍

当下星回节习俗在各地各族中大致相同,又因依托于地域性、民族性微殊,在云南各地方志的记载中,其习俗也有细微差别。至于星回节的源起,亦在多数方志中有所记载,其文化内涵也更为丰富和耐人寻味。

(一) 云南旧志的星回节起源诸说概要。星回节在明清以来云南方志中记载较普遍,且起源记载有较大相似性。诸志中的起源说主要有三:一是为照田,二是为岁节,三是为纪念先贤节烈。^①

一是照田说,指星回节起源于以火把照田从而占岁的习俗与信仰,部分史志增衍了祈年、驱虫等说法。康熙《云南府志》之“燃以照田,占岁丰歉”^②,道光《昆明县志》之“村落用以照田,以炬之明暗占岁丰歉”^③等,皆强调以火炬之明暗来占卜和预示庄稼丰歉的占岁习俗。如民国《巧家县志稿》记载“农家多燃火炬照田以祈丰收”^④,以此增加祈求丰收的心理动因。道光《宣威州志》所言“可以驱蝗,即《诗》所谓‘秉畀炎火’之意,理或然也”^⑤。又如民国《嵩明县志》所谓“并持火把遍游禾田以驱螟螣者……是晚持火把游田间,颇于农事有益。盖是时螟虫之蛾正在发生,辄自飞来扑火而被焚毙。倘持火把游田者多,则蛾之被焚者亦多,则可减少螟虫害苗之患,故于农事为有益也”^⑥,则增加了星回节驱虫灭虫的实际用途。^⑦此类记载以占岁说最为普遍。显然,此类说法与原始的火崇拜有关,应更接近于真实的起源。事实上,现在的云南各地,六月星回节被称为火把节,也确实有火崇拜的明显痕迹遗存,而在田野调查中也不难发现,在田中树立火把的情况常见,不难见占岁祈年驱虫等习俗的留存。在家门口树立火把,意欲祈求家宅兴旺,这也可视为祈年风俗的一种蔓延与扩展。

二是岁节说,意指此时为年节,附着于此上的有祭祖等说法。如嘉庆《阿迷州志》载:“六月廿四夜,村寨田宅燃火炬,名曰火把节,脍生肉食之,以此为献岁会饮之期。”^⑧乾隆《沾益

① 此外,尚有并非主流的记载,如谢肇淛《滇略》卷3《产略》载有:“火把花一名酒吊藤,诸山俱有,叶如杏,大毒,服无不死者,干之亦可毒人。滇中以六月廿五日火把节,则采此草束而燎之,故名,盖欲绝其种类……”此说基本不见诸各史志记载中,《滇略》卷4《俗略》对星回节起源的介绍也未及此说。

② 康熙《云南府志》卷2《地理》,“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1册,第56页。

③ 道光《昆明县志》卷2《风土》,“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2册,第26页。

④ 民国《巧家县志》卷8之三《礼俗》,“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9册,第380页。

⑤ 道光《宣威州志》卷2《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12册,第33页。

⑥ 民国《嵩明县志》卷19《礼俗》,“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16册,第130页。

⑦ 此实用性用途的记载与彝族关于斯热和阿提的传说颇有相通之处。斯热与阿提的故事流传于弥勒彝族中,大略谓天神斯热与民间大力士阿提竞技败亡,激怒天帝,天帝便派出大量蝗虫等到农田为害,阿提遂带领民众以火把驱烧。此后,六月二十四燃烧火把便相沿成俗。

⑧ 嘉庆《阿迷州志》卷6《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14册,第549页。

州志》云：“二十五日共燃长炬……土彝以先一日为岁，祭先祖，刲牲宴饮。”光绪《沾益州志》^①所载全同。光绪《续修顺宁府志》云：“二十五日为星回节（俗呼为火把节）……彝人以二十四日为节，其义与庆岁同。”^②此说与彝族以六月二十四为新年的习俗相呼应。

三是纪念说，指此节为纪念贤人节妇、英雄义士或受难者而设。这类说法涉及阿南、慈善、孔明、关羽、王忠文、段功等。^③在云南各类旧志中，星回节起源涉及的纪念对象有四，分别为阿南、慈善、诸葛亮、关夫子，并分别形成了或详或略的传说和故事。其中前三说在各方志中屡以大致相同或相近的文字反复出现。如民国《景东县志》云：

六月二十四日为星回节，燃松炬，俗谓洒火把，照田占岁。相传汉有夷妇阿南，为叶榆酋长曼阿娜妻。元封间，汉将郭世忠杀娜，欲妻南。南要以三事，一设幕次祭故夫，二焚故衣，易忠新衣，三要部人俾遍知。忠诺。是日构松棚聚火于下，村落聚观。南握刀出，俟火炽，尽焚其衣，引刀自断，扑火中。众哀之，每是日燃炬以吊之。一云南诏皮罗阁欲并五诏，将诱会于松明楼焚杀之，邓赅妻婁慈善测其谋，劝其夫勿赴。夫不从，以铁钏约夫臂，继而果被焚。慈善认钏得夫尸归葬。皮罗阁闻其贤，欲娶之，慈善闭城死节，滇人于是日燃炬吊之。一云孔明于是日擒孟获，经夜入城，父老设燎以迎。后遂相沿成俗。是日以豆笋瓜茄猪肉等类细切和匀而食，名曰和菜。^④

在如此大段的记载中，仅以“照田占岁”4字来略略点出照田说，却用相当多的篇幅较为详尽地记述了关于火把节来历的3种纪念说。此段文字并采三说，其态度大抵是“未知孰是”，因此并而录之，不加详考。实则此段文字所述内容较早见于《夔古通纪浅述》《南诏备考》《南诏野史》等元明以来的文献，其文字基本沿用成习，互文性极强，显然出于同源。关夫子诞辰说，则见于罗平一地的方志有关记载中，如康熙《罗平州志》载：“六月廿四日新奉都宪蒋颁发关夫子系六月二十四日生辰，知州黄德巽立碑庙中，届期率属祭祀。又俗号星回节，儿童燃炬夜戏。”^⑤此说在民国《罗平县志》中基本原文援引。实际上，纪念说只是汉族及少数民族对星回节起源解释性传说的极小部分。在云南古近代方志之外的汉文文献中，梁王杀段功、吊忠臣王忠文二说也作为星回节起源加以记录或传写。梁王擒杀段功之说，见于明人王士性之《广志绎》卷5：“或又云是梁王擒杀段功之日，命其属举火以禳之也。”^⑥吊王忠文说见于明人沈德符之《万历野获编》等，云：“问其原，则是日为洪武间遣侍御王忠文祔说元梁王纳款，不从，为其所醢，以此立节，亦晋人禁寒食，楚人食角黍之意也。”^⑦

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以英雄或传说人物解说火把节起源的纪念说更是蔚为大观。其中，彝族的火把节故事最为丰富，各支系都有不同传说，仅在弥勒彝族中，便有流传较广的斯热和阿

① 参见乾隆《沾益州志》卷2《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17册，第33页。

② 光绪《续修顺宁府志》卷5《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35册，第213页。

③ 纪念说，其实还应包括斯热、阿提、天将等少数民族火把节传说中的英雄人物，然皆不见于云南各府县志的记载。

④ 民国《景东县志》卷2《地理志·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32册，第644页。

⑤ 康熙《罗平州志》卷1《岁时》，“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19册，第78页。

⑥ 王士性：《广志绎》卷5《西南诸省》，中华书局，1997年，第130页。

⑦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4《风俗·火把节》，中华书局，2004年，第622页。此外，王盈科之《雪涛谈丛》亦有类似记载。

提故事（这一故事与驱灭虫害有关，前文曾提及）、杀灭蛇害的阿巴扎和伊里妹故事、①斗妖为民的阿勒格和丽格故事②等。纳西族关于火把节的传说也很丰富，最为著名的是天将救民故事。③此外，拉祜族、基诺族、傈僳族等皆有关于火把节起源的传说。总体看来，这些传说以英雄化的人物为核心，或为人间除害，或与天神抗争。不过，段功、王忠文及异彩纷呈的各少数民族火把节英雄故事皆未收入云南古近代各通志及府县志中，云南方志钟情于递相传述的纪念说仅仅限于阿南、慈善夫人及诸葛亮等有关传说。

（二）云南方志中星回节起源记载对比。星回节习俗在云南非常普遍，各府县志大多有记录，岁时风俗中关于星回节之记述，仅有如嘉庆《永善县志》、光绪《镇雄州志》等寥寥数部。④可见，星回节在明清时期的云南并非点状散落，而是铺开式、普及化的存在。综考云南各省志及府县志，除少数几志未有星回节的记载或无关于其来历的记载⑤外，其余各志均有星回节来历缘由的记载。经考察，笔者认为各志对星回节来历的记载有如下特点：

一是照田、岁节、纪念这三大类说法，在云南各地自明清至民国的史志记载中并不均衡，而是有偏重和取舍的。考察云南各地自明清至民国的史志可见，岁节说并不普遍，仅有数部方志涉笔，且记述并不详尽。相较而言，照田说较为普遍，凡有记载星回节习俗者，多存照田起源说，所考察的60余部史志中仅7部不涉及照田说。其中，道光《昆阳州志》、民国《巧家县志稿》、乾隆《东川府志》等15部史志仅涉照田祈岁之说，而不及纪念说、岁节说。不过，这不足以说明在这些地区，纪念说不流行。比如，嘉庆《临安府志》亦记载了阿南、慈善夫人二说，不及照田之源，而临安府治下的建水州，其志又无纪念说，同为临安府治下的石屏州，其志则载有照田及纪念阿南二说。管中窥豹，同一地域的有关记载可能会有疏漏和歧异之处，这在相当程度上与该方志岁时风俗记载的详略程度有关。至于纪念说，影响则不可低估：在60余部方志中，仅康熙《平彝县志》、乾隆《东川府志》等17部方志不涉及纪念说（且其中不少方志于其余岁时风俗之记录本就较为简略）。可见，照田与纪念是星回节起源中占主导性的说法。然而，兼及照田与纪念的方志中，二者的份额往往差异极大：照田说往往一笔带过，而纪念说则往往用了较多的文字来再现其传说故事，着墨力度差异极为突出。

二是纪念说内部的不平衡性突出。滇内外关于星回节起源的纪念说多样，蔚为大观。然而，在云南古近代各方志中，阿南、诸葛、慈善三说呈压倒性优势，流行最广，影响亦最大。其余如关夫子诞辰纪念说仅见于新平县的方志，纪念段功及王祚之说仅见于滇外人士的杂谈式记载中，

① 阿巴扎和伊里妹故事流传于弥勒西山一带。相传为庆祝阿巴扎和伊里妹杀死为害一方的蛇精，为民除害，附近民众赶到，围着火堆欢歌乐舞。为记住这一天，阿巴扎用剑在岩壁上刻下“己巳六·二四”等字。从此，每年的六月二十四，西山阿细人便将各村点燃的火把汇聚于此。

② 阿勒格和丽格故事流传于弥勒五山阿者人中，故事大略是阿勒格和丽格为了消除地方的风沙之患，深入妖洞想取得赶山神鞭，却在与妖精的搏斗中牺牲。据说，这一天就是六月二十四，而此后人们每年此日都到村外对歌跳舞，歌咏二人，以表怀念。

③ 故事大略为：玉帝偶于天宫窥见纳西人生活之地美不胜收，嫉妒之下，命一员天将下凡以火烧尽纳西。天将不忍烧毁美丽的纳西族地，便欺骗玉帝，虚报已毁。后来，玉帝于六月下旬打开天门下望人间，发现被骗，便杀死天将，另派一将执行命令。第二员天将亦不忍，便教纳西人连续三夜四处点燃火把以欺骗玉帝。玉帝见纳西族地已成火海，遂罢之。为纪念两员天将，纳西人每逢农历六月这三天便要点燃火把。

④ 如民国《昆明市志》、光绪《镇雄州志》于节令习俗中未记载星回节，光绪《安宁州志》未记载节令习俗、民国《昭通县志稿》、宣统《恩安县志》、康熙《富民县志》《晋宁州志》等无详细的风俗记载。

⑤ 如光绪《呈贡县志》仅云：“六月二十五日各家燃松炬或照田，其事近戏。”道光《晋宁州志》仅云：“六月廿四五日食生盘，夕燃火炬，名星回节。”雍正《师宗州志》仅载：“六月二十四日为星回节。”

在滇中的方志中皆不被采录。因此，在滇中方志中占据主流地位的纪念说主要是阿南、慈善和诸葛亮三说。阿南、慈善、武侯三说，在云南各府县志中的记载也并不均衡。总的看来，三说并存于明清以来的云南各方志中的情况最为普遍，不仅康熙《云南通志》、乾隆《云南通志》等省志并采三说，各地方志如康熙《云南县志》《峨峨县志》、乾隆《宜良县志》《新兴州志》、道光《澄江府志》《宣威州志》、民国《景东县志》等18部府县志亦并录三说。细考可见，三说并存的史志多转录他书，互文性突出，仅有个别字句的变化或详略的微殊（诸志所述之源，主要在谢肇淛之《滇略》，对此，下文再分析）。此外，道光《昆明县志》、民国《路南县志》《嵩明县志》《续马龙县志》《元江志稿》《大理县志稿》仅录阿南、慈善二说。乾隆《沾益州志》录慈善、孔明两说。康熙《通海县志》录慈善一说，道光《新平县志》录阿南一说。各志于阿南、诸葛、慈善三说的并存或去取，并无明显的地域性规律呈现。比如，昆明经济文化辐射区域内的昆明县、嵩明县、宜良县或存三说，或存二说。

二 忠节的力量：对纪念说之疑的抗辩与忠节化选择

虽然阿南、慈善、武侯纪念说颇呈泛滥之势，却也不乏有识之士提出质疑。质疑主要集中在认为星回节期间的有关风俗或星回节的时间与传说有悖谬不合。有意思的是，有关质疑不仅见诸滇外杂谈笔录式的著作，也见诸云南的地方志中。

云南各方志中提出的质疑主要针对诸葛、阿南和慈善而发。比如，谢肇淛所著《滇略》即认为火烧松明楼事亦不可据，云：“至唐，南诏亦假是日（星回节）宴会，召五诏醉而焚之，人谓此节起于南诏，非也。”^①是说强调的问题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论争：既然是假借星回节的名义宴会而火烧松明楼，那么，星回节的成立自然早在火烧松明楼之前，又怎么可能起源于兹呢？再如，光绪《浪穹县志》录高上桂《星回节考》，其质疑详细且辩驳有力。云：

按《南诏野史》蒙氏欲灭五诏，预建松明楼祭祖于上，诏曰六月二十四日星回节当祭祖，不赴者罪。各诏于二十四日皆至，登楼被焚死。当是时，先有此节，特因节以焚楼，非因焚楼以传节，且焚楼事在六月二十四日，而妃死节闭城三月食尽之余，国人何为于是日吊之？其说近诬。或云以武侯是日擒孟获，侵夜入城，父老设燎以迎，说见《通志》。以《南中志》考之，武侯五月渡泸，至秋而四郡平，其擒孟获挡在夏秋，以是日为擒孟获日，似不甚违。然孟获煽诱诸蛮，必待七擒纵而后服，则擒渠时，众方抗命，岂有设燎以待者乎？即有之，而擒非一次，擒之地非一所，擒之时非一日，何皆以二十四五日为此会？且加以星回节名哉？郡志载，汉元封间，叶榆夫人阿南为首长曼阿娜妻，娜为汉将郭世忠所杀，欲妻阿南。南给以聚国人使遍知礼嫁，张松幕焚故夫衣，引刀自断，仆火而死，时六月二十五日，故国人岁岁□以吊。是其事又在蜀汉前。说既互异而星回节之名？不可解。^②

此说论证了星回节来源中较多的可质疑之处，阿南、诸葛、慈善诸种纪念说的疑点均被一一点出，确实很难辩驳。

显然，星回节的纪念说并非不刊之论，甚至方志的编撰者也并未忽略质疑的声音，而将之纳入所编撰的方志中。然而，民国《宣威志稿》却道：“三说（笔者注，指武侯、阿南、慈善三传

① 谢肇淛：《滇略》卷4《俗略》，“钦定四库全书”史部，第494册。

② 高上桂：《星回节考》，光绪《浪穹县志》卷12《艺文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76册，第348页。

说)不同,然皆是日,故实传信既久,无容訾议。是火把节之兴,原于服忠武之盛,表贞烈之德,历久而不废,而驱蝗逐疫诸事,遂乘乎其间耳。”^①此论颇有挟忠武节烈之力即所向披靡、不容訾议的强势。值得注意的是,此论理直气壮的根基,正在“忠武节烈”4字,这正是儒家思想中较为突出的要点。挟此以抗辩,似无理,却可气壮。其关键在于,明清时期云南一地儒家思想与教化的濡染已经非常深厚而有力。至此,也可概要出阿南、慈善及诸葛亮纪念说的核心正是儒家的“忠节观”,三说的主流化,亦即星回节起源在云南方志中的“忠节化”。

显然,星回节起源记录的忠节化普遍而鲜明地存在于明清云南各通志及府县志中,具体表现为民俗与实际起源在记录中的弱化及少数民族英雄传说在纪念说中的阙如。忠节化形成的根源及其价值,则是接下来要探究的问题。

三 涵濡和认同:星回节起源记录的忠节化与文化认同的关系

云南一地,具有典型的边地化与多元民族特征。由于地理位置远离政治核心,云南长期处于经济、文化等的边缘和非主流区域。云南的民族杂居和聚居地区,往往又因其远离核心的地理位置及山高路险的交通困境而较易在自我习俗的滋生与传承中安守其生活与信仰的常态。外来思想与力量的融入、汇通乃至改造原本的文化生态,在这样的地区往往极其困难。然而,却也可在长期的春风化雨中浸润并萌芽新芽。降至明清,随着国家大一统的日益强化和有力,随着流官、移民入滇及其影响力逐渐加强,以及儒家思想伴随着官学教育的推进而渐入人心,云南少数民族思想、习俗与文化的内地化倾向逐渐加强,并表现于社会及文化生活的多个方面。^②这些反映的是在长期的文化濡化之下,相对低位的文化向高位文化的靠拢与认同。而云南地方志中星回节起源说的忠节化与之正有密切而直接的关联。

其一,儒家思想与文化的规定及引领。从时间考察可见,云南各方志中采纳的星回节纪念说,其人物归属的时代虽自汉代(阿南)、三国(诸葛亮、关羽),直至唐代(火烧松明楼、慈善夫人)。不过,有关传说首见于典籍记载的时间却在元明,与传说人物所在的时代实已相去甚远。

唐宋时期关于云南的诗文史著等,均未提及阿南、慈善、孔明灯传说。虽不排除朱元璋下令焚毁云南典籍带来的可能影响,但如樊绰《云南志》虽有关于六诏较为清晰的记载,却无只字片语提及慈善夫人事,其关于邓赅诏的变迁历程记载也与火烧松明楼、慈善夫人等毫无关联。

元代历史文献方零星出现关于纪念说的影子。梳理可见,元代文献中,纪念说的存在并不普遍,甚至仅见的记载也历来为学界所怀疑。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记录有白人于“六月二十四日,通夕以高竿缚火炬照天,小儿各持松明火相烧为戏,谓之驱攘”^③,却丝毫未道破其中缘由。《夔古通纪浅述》虽落名元代赵顺,但对其是否为伪书以及书中材料的历代增补情况已有诸多疑问,故而虽有因火烧松明楼及慈善殉节而有星回节的记载,但只能姑存之。宋元间,张道宗的《纪古滇说集》言及慈善事,云:“邓川东十里邓赅诏之妻名慈善者,因诏先被平,慈善筑城负固之,神武王亲率兵去欲妻之,慈善坚执不从。誓曰‘一女不更二夫’,乃居城以自守,王领兵因攻之,不克。慈善卒,王嘉其节,赐号德源城,亦修理之。”^④值得注意的是,此记载并无火

① 民国《宣威志稿》卷8之四《礼俗》,“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13册,第290页。

② 如部分少数民族为参加科举考试而隐瞒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主动改为汉姓等。再如,赵炳龙、何邦渐、木增等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作家乐于且娴于以汉语创作,谙熟汉文学经典样式,并取得相当成就。

③ 李京:《云南志略》,转引自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卷2,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8页。

④ 张道宗:《纪古滇说集》,“大理丛书”之《史籍篇》卷2,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28页。

烧松明楼之说，也未将慈善守节与星回节的起源相联系。

至明代，慈善守节、火烧松明楼、阿南殉夫、诸葛入滇等事件与星回节的联系化记载渐多渐广。将松明楼、慈善、阿南星回节起源相联系的最早可据文献，应是杨慎所著《南诏野史》《南诏备考》。《增订南诏野史》记载：

逻阁乃预建松明大楼，祀祖于上。使人谕五诏曰：“六月二十四日乃星回节（蔚按：《大理郡志》，汉元封间，叶榆妇阿南者为酋长曼阿娜之妻。娜为汉将郭世忠所杀，欲妻南。南曰：能从三事，当许汝。一作幕次祭故夫；一焚故夫衣，易君新衣；一令国人皆知我以礼嫁。忠如其言。明日，聚国人张松幕祭其夫。下置火，南藏刃出，俟火炽焚夫衣，即引刀〈刃〉自断其颈，仆火中，时六月二十五日也。国人哀之，故岁以是日燃炬吊之，名为星回节云。是又当为二十五日）当祭祖，不赴者罪。”四诏听命。……逻阁既灭四诏，取各诏官人，念慈善慧而甚美，遣兵围其城，迫取之。慈善曰：“吾岂忘夫事仇者？”闭城坚守，半月城中食尽，慈善度不能支，即自杀，时七月二十三日也。逻阁嘉其节，乃封赠为宁北妃，并旌其城曰德源城。城废址在今大理府邓川州城东北二里许。^①

杨慎所著《南诏备考》中也有类似记述。杨慎曾点校过《夔古通纪浅述》，又为《纪古滇说集》作跋，前人亦曾质疑杨慎对《夔古通纪浅述》作过增订和改写。对上述说法，笔者不敢妄断，不过杨慎对星回节起源与火烧松明楼、慈善夫人守节、阿南殉夫之间固定化联系的建立显然居功至伟。作为著名学者、文人以及谪成滇云并与滇云文坛政坛关联极为紧密的重要人物，其《南诏野史》《南诏备考》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其后，明王士性《广志绎》卷5《西南诸省》述及松明楼事，天启《滇志》卷15《人物志·列女》等也出现了慈善起源说。纪念阿南之说则被谈迁《谈氏笔乘·纬候》、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引明杨鼎《南诏通记》、天启《滇志》及谢肇淛《滇略》等递相传录。至于孔明、段功诸说，则分别见诸《谈氏笔乘》《广志绎》《雪涛谈丛》等明代典籍。谢肇淛之《滇略》为笔者所见最早将阿南、慈善及孔明三说并录之史籍。其后，此说为清以来的云南通志广泛采录传引，并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覆盖面。

纪念式起源说在元代及明代的集中出现，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与滇云儒家思想的传行涵濡有着微妙契合的时间对应性。伴随着大一统国家政权的巩固与管理的强化，以儒家思想为重要价值和理念核心的汉文化在元明清时的云南也得到强有力的推进。元代风气初开，儒教方兴。明清，云南儒学教育则已渐成大观。据《新纂云南通志》卷16《历代贡举征辟表》及卷134《学制考》统计可得，明代云南共有儒学约70所（包括元代兴建及明代兴建者）、书院约70所，产生进士约250人、举人约2500人。清代云南共有儒学约80所、书院200余所，产生进士近900人、举人万余人。^②可见，明清两代为云南儒家教化教育的高峰期，其推进之明显、人才之鼎盛在云南旷古未有。儒学的蔚然、人才的涌现，为明清时期云南各府县志的编撰提供了人才基础，也决定了各府县志编撰者的指导思想与前提。

显然，关乎忠节的纪念说在元或明诞生并得到有力的传述，应当与儒家教化在云南的推进密切相关。从传说发生的地点来看，以大理为中心的滇西北是传说相对集中的区域，而这一带，也正是明清时期云南文化的核心板块之一。如此种种，并非偶然，而是颇能据此推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的影响与决定性力量。

① 杨慎、胡蔚：《增订南诏野史》，“大理丛书”之《史籍篇》卷3，第430页。

② 参见《新纂云南通志》卷16、卷134，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21—428、466—618页。

其二，儒家思想传播的借力之需与载体之责。国家大一统思想的强化中，思想与文化认同至关重要。“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所言诚是。滇地与中央政权的分合交织至强化大一统的过程中，文化的涵濡和认同自始至终极为重要，与军事、经济、政治等共同承担了国家统一和边疆治理的要职。地方志既是一方文献与历史的存续，也是思想与文化观念的载体，还是倡导和宣扬某一倾向性思想的有力工具，蕴含丰富的文化养分与政治因子。而云南各地方志对星回节起源的记载，亦兼有历史记录、文化承载和思想倡导等方面的价值与意义。

在云南各方志中，星回节起源记载的忠节化倾向，既是儒家思想与教化在云南产生普及性影响的必然结果，又为儒家思想的进一步深入涵濡于云南的地方少数民族文化提供了契机和助力。星回节本身具有的民间民族原生性和普及性，使之成为云南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节日。有意也好，无心也罢，将儒家的忠节观念和思想附着于星回节起源的记载之上，显然会逐渐达到一种潜移默化的思想宣传效果。伴随着节日的盛宴与狂欢的氛围，借力于人们寻因探源的心理期待和行为，被各府县志广泛记载的起源传说极易产生深入人心的影响力。与之相反，被各府县志摈弃在外的少数民族英雄传说，其影响力和普及度则难免有所局限，甚至逐渐湮没无闻。可以说，云南地方志中星回节起源记载的忠节化，是儒家思想文化与本地民风民俗相涵濡融合的结果。星回节及其起源传说成为儒家道德教化的载体，成为儒家思想和观念在云南进一步扩大影响的有效助力。

从不知孔孟的蒙昧到宛然中土的新风，云南一地社会风气与思想的变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了自先秦至明清漫长历史时期的披荆斩棘。在这一融合过程中非对抗性和对立性的融入涵濡至关重要，显然，因势利导，因地制宜，方能取得良好效果。因此，儒家思想在明清时期云南的传播，从来不能仅仅依靠刻板的教导和宣扬，也需要注重与当地文化的涵濡，并多元化地借助当地民俗、地方风物、民族节庆和文学的力量，并经过一定的选择和改造，从而潜移默化地融入习听者、知见者的耳目心田。星回节起源的忠节化倾向便是极为典型的例子。不仅地方志的记载忠节化，星回节的有关歌咏也如是，如对慈善和阿南“不谓蛮烟炳星日，令节直追前贤踪”^①，“存亡自古由天命，日月争光惟节行”^②，“汉酋之妻唐诏妇，两人高节共千秋”^③等赞美。

云南各地方志中，星回节纪念式的起源推测将富于儒家思想与教化功能的传说故事附着累积在云南星回节的信仰来源之上，并以铺开态势存在。与之相伴随的，是附着了原始信仰、少数民族英雄化特色的历史记忆在云南地方志中的弱化，以及在现实中影响力的区域化、破碎化和局限性。上述情况，便导致和构成了云南地方志中星回节起源记载的忠节化倾向。这一典型倾向体现了文化认同的推进过程中，强势文化对边地民俗信仰的借力、渗透及改造，体现了方志书写的政治立场与思想对历史记忆的选择性吸纳，凸显了主流文化的影响力以及在国家一统、边地及多民族地区思想治理中的价值。

（作者单位：大理大学文学院）

本文责编：詹利萍

① 徐松：《星回节》，乾隆《宜良县志》卷4《艺文》，“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22册，第575页。

② 谢琼：《过柏节祠吊慈善夫人》，光绪《浪穹县志略》卷12《艺文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76册，第145页。

③ 陈钊堂：《星回节吊阿南暨慈善夫人》，道光《赵州志》卷6《艺文》，“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78册，第471页。